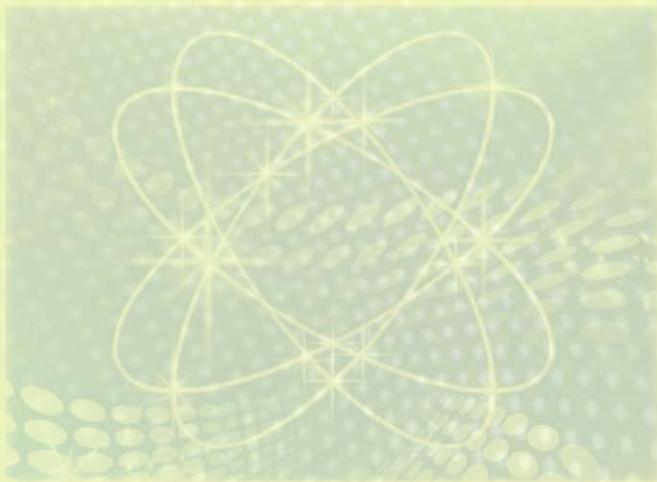


# 华文文学：“离散”与文化认同

刘桂茹 著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 华文文学：“离散”与文化认同

刘桂茹 著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www. buptpress. com](http://www.buptpress.com)

## 内 容 简 介

作为一种跨域的建构,华文文学缠绕着历史的、人文的、政治的等多重向度议题,因此具有深广的阐释空间。本书以北美、东南亚的华文文学为讨论的中心,试图进入华文文学的多种表达形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及其存在的现实语境,围绕华文文学的美学形态和美学价值、华文文学的“离散”叙述与文化认同、华文文学与“承认的政治”等问题,提出具有实践意义和学理价值的命题,从而勾勒华文文学的发展形态和美学经验,探察华族群体的文学想象及文化认同建构。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文文学:“离散”与文化认同 / 刘桂茹著. --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5635-4513-1

I. ①华… II. ①刘… III. ①华文文学—文学研究—世界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4453号

---

书 名: 华文文学:“离散”与文化认同

著作责任者: 刘桂茹 著

责任编辑: 孔 玥

出版发行: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10号(邮编:100876)

发行部: 电话: 010-62282185 传真: 010-62283578

E-mail: publish@bupt.edu.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mm×1 000 mm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237千字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

ISBN 978-7-5635-4513-1

定 价: 48.0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

# 目 录

<b>第一辑 华文文学：“离散”与文化认同</b> .....	1
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遗产 .....	3
从“认同”到“承认” .....	9
“少数者的”政治 .....	14
论北美华人小说的“中国想象” .....	24
论美国华人小说的“唐人街”书写 .....	35
华文文学：跨域的建构 .....	43
<b>第二辑 异域经验与性别书写：美华小说的女性视角</b> .....	49
性别叙事与情感场域 .....	51
深度激情的生命诉求 .....	58
“文革”记忆·女性想象·身份追寻 .....	65
越界书写与回归想象 .....	72
在中国记忆与北美经验间游移 .....	77
<b>第三辑 历史与乡愁的交织：马华作家的现实关照</b> .....	81
颠覆书写与边缘体验 .....	83
国族、家族的想象坐标 .....	89
缺席与隔阂 .....	95
<b>第四辑 以诗歌拍打心灵：异域歌者的回响</b> .....	101
美籍诗人王性初的域外书写 .....	103
生命沉潜的方式：厚重与空灵之间 .....	111
诗心、诗情与诗艺的建构 .....	117
存在的姿势与温和的紧张 .....	122

参考文献 .....	125
<b>附录一 观影札记 .....</b>	<b>135</b>
生命的轮回:一半是海水,一半是冰川 .....	137
文明的悖谬:逃跑与救赎 .....	140
肉体与灵魂的挣扎:家在哪里? .....	144
美人鱼:穿梭于假定与真实之间 .....	147
底层·都市·全球化想象 .....	151
底层视域与边缘意识 .....	155
为了守护那片心灵的家园 .....	163
新世纪以来华语“大片”的“中国梦” .....	166
<b>附录二 闽派诗歌赏读 .....</b>	<b>173</b>
山水间的禅风醉意 .....	175
心魂之思与想象之舞 .....	180
哈雷诗歌的“叙述”维度 .....	182
沉默的想象与飞扬的诗性 .....	187
<b>后记 .....</b>	<b>190</b>

第一辑

华文文学：“离散”与文化认同



# 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传播

“海外华文文学”这一概念强调了华文文学是以汉语作为语言表达工具的语种的文学，以汉语书写和想象为纽带建构文学的想象共同体。因此，以语言为媒介，以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为内蕴，离散海外的华文作家在其文学创作中表达了对母国文化或认同或依归或焦虑等等复杂情愫。应该说，华文文学的发展、演变、以至于慢慢走向成熟，都与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文化为华文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和想象支撑，同时中国文化也维系着离散华人作家的文化认同和身份意识。华文文学一方面反映了海外居住国的社会生活、人文景观、自然景观以及华人离散者的心理特征，一方面又承继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血脉，表现出特有的对中华文化的体认与思考，是对中华文化的自觉传承。

## 一、华文文学与中国“儒”文化

作为流散海外的华人肯定自我存在的方式，华文文学始终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滋养。众所周知，儒家思想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儒家所倡导的仁义忠孝的伦理观念，以及礼乐的行为规范，如同每个人身体中的遗传基因一样，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的生命之中，并且伴随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命始终。随着中国移民持续不断地移居世界各地，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自然也就被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移民带到了各个移居国。因此，儒家文化不仅成为华文文学的文化纽带与精神坐标，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化内核注入华文文学之中，延续并强化着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可以说，“儒”意识建构了海外华人的自我生成，也流淌于华文文学的字里行间，成为华文文学普遍追求的自觉精神向度。

儒家思想强调国家、民族、集体、家族的重要性以及对于个人的意义。因此，对国族利益的维护、对中华文化的执着认同、对本民族的自信自尊，以及对故土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就成了海外华人的一种共同特征和难以释怀的情愫。尤其在早期的华文文学中，深切的中国意识和中国文化人情结始终是华人的一种情感内核。在儒家传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等思想的影响下，早期华文文学普遍表现出“感时忧国”的情怀，在悲愤与感伤的基调下书写对国家、民族不可割舍的深厚感情，并以集体“大我”的方式述说“流浪者”的文化乡愁。某种意义上来说，以“儒”意识强化自身的行动准则，一方面是华人对“自我”与“中国人”“中国文化”关系的认同，另一方面也是华人面对双重文化语境寻求自我定位的心态表征。

儒家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家庭伦理。和西方个人本位相对，儒家文化倡导“家庭本位”和“人伦本位”。中国家庭内部“父与子”关系强调的是父亲的绝对权威，儿子对父亲的绝对服从。而“慈”“孝”“敬”“爱”等家庭伦理观念又使得这样的父子关系上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家国同构”的理念之下，家庭内部的秩序规范牢不可破，成为支配中国人关于血缘、宗族、尊卑礼仪等方面的准则。几千年来“儒”意识的家庭伦理观念，制约着中国人的价值理念，也同样是曾经浸染其中的华人自觉遵从与维护的中国文化传统。可以说，华人家庭对于中华文化传统及其价值观的传承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华人子女最早就是从家庭受到启蒙教育的。在家庭里，子女要孝顺父母，尊敬长辈，而享受天伦之乐是华人父辈的极大心愿和要求。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华文文学中“父与子”的关系是庄严而神圣的，与家庭、宗族、国家的传承和发展紧密相连。与此同时，父亲的形象高大威严，父亲是家庭的核心力量，父亲也是纯朴温良、勤俭坚韧的性格化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父亲负责把中华文化传统传输给下一代，而子女则被要求顺从和接受父辈的文化传统。可以说，儒家的人伦教化和文化积淀，转化成了华人家庭的内部规约，也是华文文学的普遍美学追求。

现今，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以及现代社会的种种精神危机，越来越多的华文作家开始呼吁儒家文明中富有人性的因素，追求心物合一、内外合一的创作心态和境界。弘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以及兼济天下，与自然和人类相容共存的精神，逐渐成为当代华文文学人文精神的重要内涵。以新一代华人移民为例，他们在知识与技术的掌握方面远远胜过前几代移民，也因此更能适应移民社会的生存环境，他们的创作于是表现出了面对跨文化语境更加从容的心态。除了承继母国文化传统，也愿意融入异国文化，表现出对多元文化共存格局的宽容心态，能够以一种主动的、活跃的姿态来表达华人散居者的生存状态及文化处境。因此，新移民文学的主题涵盖了中华文化传统、移民共同经验和个人漂泊经历等诸多因素，融汇了体现中国意识的民族性、逾越地域时空的世界性，以及表达个人品位的独特性。处于文化夹缝的沉痛基调慢慢被一种淡定飘远的风格所取代。这样的文化立场与思考维度不仅有助于提升华文文学开放多元的文化品位，也表明了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新发展。

## 二、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化习俗

中国文化习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中华民族特有的自然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制约下孕育、发生并传承的。深受中国习俗浸染而后移居海外的华人，并不因为生存环境和文化土壤的改变而背离原有的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相反，他们将传统中国习俗带入异域，包括节日、祭祀、庆典、饮食、服饰、社区、会馆，等等，以富于民族特色的文化方式重温母国的种种文化习俗，彰显对中华文化的执着传承。与此相应的，广大华人作家把海外华人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习俗融入华文文学创作之中，使得华文文学弥漫着浓厚的中国文化气息。

唐人街（Chinatown）是初到异国的华人的聚居地。“唐人街”也称华埠，是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一块文化“飞地”。唐人街保留着传统的中国城市风貌，那儿有红檐绿瓦，有匾额楹联，有亭台楼阁，有庙宇寺院，也有酒楼、茶馆、中国书店和专营中国百货、食杂及传统工艺品的商店。共同的语言和风俗，以及与国内相似的文化环境，让许多海外华人觉得生活在类似祖国的环境里而感觉自在。“住在同胞们中间，能减轻由于跨越太平洋后突然变化造成的不安。在这样的飞地上，他们见到的是华人的脸，听到的是汉语，在这种熟悉的环境中他们心里产生一种安全感。”<sup>①</sup>唐人街的生活方式某种程度来说，是早期海外华人为适应异域文化所选择的一种特定方式。它不仅指称华人社区，还指向着一种文化价值、种族认同与精神坐标，是广大华族寻找精神慰藉、身份建构与心灵庇护的所在。

在许多华人作家笔下，“唐人街”由于含蕴了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的诸多方面而成了后者的代名词并被反复述写。各种节日庆祝方式、中国旗袍、华人学校、家庭会馆、中药店、戏剧演出、婚丧嫁娶等风俗习惯等都在唐人街及唐人街华人家庭的日常生活当中一一上演。“唐人街提供了一种延续于移民母国的生存方式，……大量的华人社团，诸如同乡会、宗亲会、兄弟会等在这里建立，发挥着华人移民族群的分类整合和社区自律的作用，意味着华人移民族群的一种自我建构方式。而在唐人街社区中发展与传播的华文教育与华文报刊，则又成为移民抵抗文化失忆和建构身份的一种重要手段。因此，唐人街同时也作为华人移民文化保存的一种精神方式。”<sup>②</sup>当然，唐人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微缩盆景”，<sup>③</sup>内部也有许多帮派斗争、权力纠葛以及落后的文化传统。因此，在许多华人作家看

①（美）宋李瑞芳：《美国华人的历史与现状》第139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

② 刘登翰主编：《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20世纪美华文学史论》第8页，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

③ 蒲若茜：《族裔经验与文化想象》，《前言》第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来，唐人街的生活方式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传统与道德伦理，是早期华族寻求族裔属性时所认同的那个具体的“共同体”，而更多的华人后代面对家族、家庭的压力却可能选择“出走唐人街”。在一系列“唐人街”书写里，唐人街是海外华人活动的现实语境，而且是形塑华人文化性格的特定场域。从对唐人街的风俗描绘，到审思唐人街的生存方式，甚至是挖掘唐人街的悠长历史，“唐人街”想象表明了华人作家通过对中国文化习俗的绘写，历史地建构华人族属性的自觉意识。

中华文化习俗是一种无形的纽带，将海外华人“归纳”在一起，而作为母国文化习俗载体的“唐人街”的文化意蕴则成为海外华人族裔和文化存在的象征。文化习俗一方面形构了华人在海外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是延续中华文化的一种自然状态。华文文学中的“唐人街”想象，事实上是海外华人文化行为的一种隐喻，从华人学校、华人社团、华文报刊到华人家族，等等，华族在对中国文化习俗的自觉传承中寻找实现族裔与文化整合，以抵御异域文化对本族群和文化的压迫与消解的途径。在这个意义上，华文文学对中华文化习俗的书写以及相关的“唐人街”想象可看成为一种文化政治行为，是华人对自己族裔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生存状态的铭刻与建构。不过，多数华人作家的“唐人街”写作无法绕开其写作的悖论，即当他们试图以异国情调的眼光来描写唐人街，迎合主流社会的想象品味时，正好表征了其“少数者”身份的尴尬处境；而当他们试图开掘唐人街错综复杂的历史命脉时，其远离中国文化却意欲从中寻求文化资源的支撑，反而可能陷入另一种困惑——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想象素材的唐人街书写在所在国主流文化看来是一种少数民族文学，而华人作家对中国文化场域的隔膜又使得其唐人街想象成为远离中国文化语境的“域外写作”。总之，在记录自己独特生存历史与经验的文学书写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文学，正是在这样的悖论中建构了迥异于母体文化的独特性格与色彩，同时也因了母体文化资源的支撑而拥有自立于母体文化的文学价值与生命。

### 三、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化符号

移居海外的华人在面对当地政治、文化的冲击和压力下，为保持或维系族群的密切联系，继承中华传统文化成为海外华人的“自觉”行为，他们广泛的文化认同正是基于这种“自觉”的文化遗产建立起来的。因此，早期华文文学中的“中国想象”大体上是一种原乡记忆，对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和价值的体认在广大华族中形成了普遍共识。而这时的“中国文化符号”即包含了“乡土中国”与“美学中国”的糅合、华人落叶归根的思想、对母国文化在兹念兹的情结、对原

乡记忆的执着迷思以及认同母国文化的强烈意识。

但是海外华人基于血统和遗传建立的族群认同并不能维系稳定、牢靠的社会关系，这集中体现在文化身份与代际关系上。“大致说来，中国人移居海外的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移居海外后保持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依恋，他们希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得到精神抚慰；另一种是受到居留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逐渐地与中国传统文化拉开了距离，这往往是华裔的第三代、第四代。”<sup>①</sup>随着母国与移居国政治文化环境的变动，许多华人不得不逐渐完成其身份的转化，即从“落叶归根”转向“落地生根”，开始以移居国公民的身份融入移居国的生活和政治文化规范之中。因此，第二代、第三代华人移民的后代，常常为摆脱所在地“少数者”的民族身份，逐渐远离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家庭和华人社区，“出走唐人街”也成了多数华文文学共同关注的主题。

对于多数华人后代而言，祖辈的中国文化传统仅仅是其作为“华裔”身份的背景和注脚。多数华裔出生于移居国，自小受本国文化熏陶，思想和行为方式也完全本地化。即使有些华裔在中国出生，但童年的中国文化印象也渐渐模糊。因此，华裔作家虽然都不同程度地感染了“中国情结”，但他们“中国想象”的灵感要么来自于父辈的规训，要么来自于家族故事和传说，甚至有时就完全从中国古典书籍而来。更多的时候，这三者相互融合，形成了华裔作家关于中国文化的现代思维与想象。可以说，当“原乡记忆”转变成“原乡神话”之后，传统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念常常被消解、甚至被颠覆而成为所在国的一种“他者文化”。这时华文文学内部所包含的中国文化毋宁是一种抽离了本源文化的符号。

可见，谈论华文文学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时，政治环境、话语环境是不能回避的话题。这种传承，一方面应视为华文文学的文化自觉行为；另一方面当海外华人所在国的政治、文化环境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相融合时，文化传承就会被推动，而当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与所在国的主流文化相冲突时，文化传承就会停顿下来，其文化也会不断地被边缘化。如果华文文学的“中国想象”呈现了植根于母国文化语境的价值预设，其中所包含的文化符号就是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延续；而当“中国想象”经历了“本土化”历程，这种想象的维度便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缺失从而表征中国文化的符号基础之上了。换句话说，第二、三代华人或华裔所认同的是一种既区别于中华传统文化又区别于本土文化的“第三文化”，这种文化生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异变。

当然，随着更多的华人移民活跃于跨文化、跨种族的日常生活，从边缘人迈向国际人，华人离散文学也随之呈现出不同的精神内涵。正如有学者指出的，20

<sup>①</sup> 陈国恩：《3W：华文文学的学科基础问题》，《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批活跃于北美的新移民文学日益显现出移居地本土社会流变、互动、融会、杂化、交易等杂碎和拼盘式多元文化特质。许多饶有意味的文化主题都一定程度得到了挖掘和表现——海外华人个体与族群的生存经验和精神状况；跨越国界和文化藩篱的华人移民流动复杂的生命形态与心灵历程；祖国文化与移居国文化相互接触、碰撞、交流、融合等日常生活现实，以及不同的人群对此做出的种种反应；华人的生存状况、婚姻爱情和代际关系，华人移民美国的历史以及少数民族的处境与话语权问题，华人性与美国社区文化，公共知识分子式的社会批判与人道关怀……”<sup>①</sup> 新一代移民开始重新审视和认知自己的文化身份，“他们浓缩了两种文化的隔膜期与对抗期，在东方文明的坚守中潇洒地融入了西方文明的健康因子”。<sup>②</sup> 因此，华文文学又将在中华母体文化意识与居住国文化意识处既相冲突又相融合的状态中建构其“中国想象”，并在“中国想象”的谱系中对一系列中国文化符号进行重新编码，从而呈现变动不居的文化遗产与文学怀想。

---

① 刘登翰主编：《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20 世纪美华文学史论》第 130 页，上海三联书店，2007 年。

② 陈瑞琳：《“海外新移民文学”探源》，《江汉论坛》2013 年第 8 期。

# 从“认同”到“承认”

## ——海外华人文学的文化政治诉求

长久以来，海外华人的文学想象充满着边缘人的孤苦与漂泊情结。相对于主流社会，挣扎生存的少数民族群要么遭受不公正待遇，要么变成“沉默的大多数”。因此，海外华人文学的主题常常在追寻文化身份认同与抗议种族歧视之间徘徊，去国离家的孤独感和文化边缘人的角色常常使作品染上沉重的凄凉的基调。

在北美华文文学的历史脉络里，自20世纪初期反美华工禁约文学开始，《苦社会》、“天使岛”诗歌等就以抗议歧视、恳求宽容形成早期华人移民文学的呼声。而五四前后的旅美留学生文学、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旅美台湾文群、旧金山的华人移民作家群体、20世纪80年代的新移民文学，也都不同程度地在想象中国的跨域书写中发出边缘群体或低沉或激昂的心声。当然，如果把视野再转向东南亚的华文文学世界，人们同样可以感受到夹杂在厚重的热带雨林气息里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国情愁。对于广大的海外华人或华裔而言，他们的文学想象与书写除了承载着双重文化经验与文化身份的复杂版图，更蕴含着这些特殊群体寻找认同空间的艰难与辛酸。

因此，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属性是贯穿于海外华人文学写作与研究的重要课题。作为少数族裔的华族，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追寻一方面是其边缘状态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离散华族遭受主流话语压制的结果。当离散作家遭遇异质文化的冲击，必然面临自身存在与认同的危机和拷问，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困惑与选择。如果说，“离散”是某种后现代普遍的人类文化特性或生命状态的话，那么不安于这种状态，追寻某种生命归属意义的完整一致，便是离散写作的内在动机。“离散”揭示了这种追求和追问的精神特质和哲学处境，而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生活的描述。因此，海外华人文学的离散经验，不仅是华人个体可能面对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惑，而且是“少数者”关于身份认同的整体性追问。

随着各民族和人群在世界范围内的移动，以及全球化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文化、经济活动空间的压缩，跨越疆界的移民、放逐和迁徙，形成了20世纪

以来独特的、全球性的“离散”现象，并且带来了空前突出的包括身份问题在内的文化“认同危机”，从而使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问题在文化研究领域内成为聚集了众多矛盾、论争和复杂性的问题领域。“认同”这一概念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广泛使用应该是在“文化研究”转向以后。全球化及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解构主义等纷纷把边缘群体的话语权、种族差异、移民问题、性别差异、性偏好等许多问题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于是，弱势群体如妇女、移民、少数民族、第三世界等边缘角色的身份问题成了理论关注的焦点。面临同一性和差异性这个议题时，“认同”这一概念恰好是处理个体怎样融入群体、获得身份的有效术语。被忽视的边缘群体和个人，他们的“认同”危机以及文化身份的建构，是理论家从不同的立场试图处理现代性、全球化以及差异性问题的思考，试图揭示被遗忘、被遮蔽的问题，从而带来解放的意义。

然而，“认同”理论首先假设了获得身份的主体是单个的人。个人是身份的占有者、建构者，是“认同”的能动力量，并且具有先验的合法性。也即是说，人们通过“认同”的建构，获得一个关于自我身份的认识，而并非一个具体的共同体。在这里，人们争取的是一个差异的个体。然而当代多元文化主义政治的核心和趋势是微观的政治、“差异的政治”，是对某种文化特质与文化结构的承认，诉诸于一个集体的目标。“认同”理论所追求的文化政治空间便显得有些狭隘。

20世纪90年代以来，“承认”问题在哲学、政治等领域日益突显。哲学家阿克瑟尔·霍耐特在其代表作《为承认而斗争》中认为，所谓“蔑视”就是拒绝承认，是对承认的否定与剥夺。个人自身完整性、荣誉或尊严的被伤害是不公正感的规范内核，而缺乏承认的社会不可能成为一个被广泛认同的公共社会。加拿大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在《承认的政治》中也指出，我们的“认同”部分地是由他人的承认构成的，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只得到他人扭曲的承认，就会对人的认同形成消极影响，甚至导致自身被蔑视。蔑视不仅表现为缺乏应有的尊重，它还能造成可怕的伤害，使被伤害者背负着致命的自我仇恨。所以，正当的承认不是人们赐予别人的恩惠，而是人的一种至关重要的需要。

在《承认的政治》一文，泰勒指出，对于承认的要求，“代表了少数民族，‘贱民’群体和形形色色的女性主义的这种要求，成为政治，尤其是所谓‘文化多元主义’政治的中心议题。”<sup>①</sup>泰勒认为，普遍主义政治强调公民的平等与自由，而并不诉诸保存文化差异这样的集体目标；差异政治则强调每个人独特的认同，是对于特殊性的承认，而文化承认对于一个移民社会而言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泰勒把问题从“认同的政治”转向“承认的政治”，认为如果我

<sup>①</sup> 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第29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们的认同不能得到他者的承认，或者受到扭曲的承认，都是一种压迫的形式。尽管泰勒的观点遭到了来自文化多元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批评，但他关于尊重差异、“文化承认”的观点却值得海外华人文学研究者做深入的思考。随着全球政治文化语境的嬗变，海外华人作家所孜孜以求的文化身份和认同意识，不仅仅应该是“我从哪里来”的问题，更应是积极建构少数族裔主体性，以一种“差异的美学”寻求文化他者的承认，并以此反抗不平等的压迫。这也是作为“少数者”之华人文学的文化政治诉求所在。

20世纪80年代至今，海外华人文学呈现了不同的精神内涵，越来越多的华人作家开始学会坦然面对多元文化语境，以一种较为轻松和自信的姿态，试图开拓宽容与自主的族裔生存空间。当然，追求宽容并不是向意识形态与文化体制妥协，“宽容”包含了“战争”，希望通过不懈的文化抗争改变“少数者”沉默不得发声的状况进而获得发声的权利。以多元民族和文化并存的美国社会为例，文化“大熔炉”理论或者“模范少数族裔”的称号已不再适用，压制或融化少数族裔也不可能是明智的政策。在少数族裔的不懈努力与抗争下，单一的文化叙事渐渐被多元宽容的声音所取代。这是如华裔美国文学一样的“少数文学”进行弱势论述的有利语境，也是“承认的政治”得以实现的可能性空间。

“少数文学”的概念在德勒兹、瓜塔里看来是“少数族裔在多数的语言内部建构的东西……文学中的一切都是政治的……一切都具有集体价值。”<sup>①</sup>这也是与自由主义针锋相对的“多元文化主义”一再坚持的“差异政治”立场，是对普遍主义命题的否定，对中心结构的背离，也是对多元文化形态的呼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少数文学”之一的海外华人文学，既是一种文学审美的过程和情绪的抒发，也是关于“弱勢者”的悲歌，更是“少数者”发出的独特的抗争声音，是追寻“承认的政治”的文化行为。

一方面，“少数者”的文学想象是关于离散者的经验表达。自19世纪西方殖民帝国主义以降，移民、流亡、散居、留学等等原因造成了大量的人口移动。无论是被迫放逐还是自我放逐，这种放逐的经历以及由此引发的漂泊乡愁和故国回望，成了现代性想象里一个重要的历史与文化命题。“离散族裔”被迫出入于多元文化之间，“离散”在当今的语境下，比早期涉及放逐与大规模族群被迫搬迁的悲苦情境来说，或许在某个层面上，也拥有其更宽广和多元的视角，因而得以重新参与文化的传承、改造和颠覆。因此，海外华人文学的离散经验，不仅是华人个体可能面对的精神困境，而且是“少数者”关于身份属性的整体性追问。而在不断的追问与建构过程中，少数族裔主体性的意识才得以渐趋成熟。

<sup>①</sup> 陈永国编：《游牧思想——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第111—113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另一方面，“少数者”的文学写作是表述自我、再现族裔历史的有效手段。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海外各国的所谓正典历史与文学场域有意忽视、遮蔽甚至篡改华裔族群的真实存在与边缘声音，造成了华族历史的缺失和记忆的混乱。以在美华人的情况为例，早期华工对美国西部建设的贡献并没有进入主流历史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经历与个人命运没有得到应有的表现与重视。因此，广大华族作家或书写华人群体普遍受到的冷遇，或建构弱势族裔的历史脉络，这对于对抗单一意识形态与文化体制，修复族裔文化记忆，再现与铭刻族裔历史有着重要的文化与政治意义。早期华人移民的书写，就表达了希望得到美国及政府宽容的愿望，并抗议遭受的虐待与歧视。这种“恳求宽容、抗议歧视”的言说冲动，“充满了苦涩、愤怒与哀求。”<sup>①</sup>正如尹晓煌教授以翔实资料论述“天使岛诗篇”时所指出的，这些“悲伤的心歌”是“美国华人历史中特殊的一章”，<sup>②</sup>在美国华裔文学发展史中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华族作为少数群体的文学表达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一种关于历史的叙述，以边缘的声音向中心突围，体现了“少数者”的文化政治诉求。对于海外华人作家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为他们提供了可以言说的素材和富含隐喻的功能，使他们能够在两个世界、两种文化、两个声音、两种语言之间，以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视角，审视生命、关注存在。同时，他们又作为弱势种族和边缘文化的代表，向强势种族和主流文化喊出自己的声音。

在大多数后殖民理论家看来，叙述可以弥补历史记录，可以召唤或激发本土文化的想象。正是在一种历史性的结构中，叙述填补了历史中的结构性缺陷。叙述本身变成了一种召唤记忆的途径。对于一个历史被毁灭的民族来说，一则关于过去的故事，即使它的全部或部分都是虚构的，也能达到一种补偿过去的作用。而这常常是少数族裔写作或边缘写作的策略。它不仅在于技巧或手法的探讨，而更重要的是作为少数话语的生成方式。作为后殖民论述里的“离散美学”，海外华人文学仍将继续建构一个个色彩斑斓的“想象的故国”，通过一系列的文化斗争，包括族裔建档、文化遗产确证、华裔社区建设，等等，以期创造一种集体的记忆，修复被湮灭的历史，于文化记忆的断裂处找寻可以缝合情感创伤与心灵寄托的文化家园，探寻“家园的政治”。这也是近年来海外华人文学领域中颇为引人关注的美国华人文学所呈现的话语方式与文化政治命题。

按照学者尹晓煌的梳理，自北美第一位华裔女作家水仙花的作品开始，第二代华裔作家的自传性作品以及当代美国华裔文学，从致力于在美国社会寻求一席之地慢慢转向多元化声音的呈现。在尹晓煌看来，20世纪60年代永远地改变

① (美)尹晓煌：《〈美国华裔文学史〉引言》第7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② (美)尹晓煌：《美国华裔文学史》第29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